

研究論文

社區人際網絡與社區意識及 參與關聯性之研究： 不同營造經驗社區的比較*

王光旭** 黃怡臻***

摘要

社區營造的理論表明，營造有助於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透過對社區意識的強化，達到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促成社區發展與民主深化的目的。然過去研究在方法上也反映兩點不足之處：其一，雖然多數研究肯定人際網絡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重要影響，但對社區內人際網絡的測量，大多還是以李克特量表的認知測量為主，反映的是對關係的想像，而非實際的關係；其二，社區研究的成果，大多從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的角度檢視，而非從社區居民的調查中呈現，

-
- * 本論文初稿發表於 2016 年 10 月 22-23 日，2016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的深化與挑戰：台灣新政局的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辦。感謝會中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林淑馨教授的評論與建議。本論文感謝科技部計畫（編號：MOST 105-2628-H-024-001-SS2）經費上的支持，也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斧正與建議，讓本文更臻完善。然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 ** 通訊作者，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70005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電話：06-2133111ext. 954，傳真：06-2133197，E-mail: gxwang@gm2.nutn.edu.tw。
 - ***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因此多反映社區領導者對自身營造成果的評估或想像，而非代表居民實際的看法與狀況。基此，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的應用，以社區居民為調查對象，重新驗證前述命題。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擇定規模相當的兩個都市型社區進行調查 (有、無營造)，並透過系統抽樣各抽取約 300 位居民進行面訪。本研究成果如下：第一，對目前社區研究中對人際關係或社會資本測量的方法進行補充，以社會網絡分析強化相關測量的信效度；第二，以更嚴謹的研究設計了解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關聯性；第三，驗證社區營造經驗對強化居民間的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程度的效果，藉以系統性檢視社區營造政策成效。

關鍵詞：社會網絡、社區參與、社區意識、社區總體營造、社會網絡分析

The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Building

Guang-Xu Wang*, Yi-Jhen Huang**

ABSTRACT

Community building not only has driven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cently but also has brought scholar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o the field of community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ha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romote democratic society.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community building is good to re-establish interaction among inhabitants, 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
- *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gxwang@gm2.nutn.edu.tw
- ** Master's Degree,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In addition, strong connections among residents can encourage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promot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deepen democracy. Nevertheless, there are two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community network studies: first, the most widely used network measurement is through a perceptu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ties, but the results cannot reveal actual relationships among residents in a community; second, mos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gather data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or chiefs of village rather than residents. Thus, this paper appl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to explo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id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ore than 300 residents were systematically sampled in two communities, one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other with non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by using a more rigorous research design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articipation, and shows that appl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n supplement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r social capital to improv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analytical results verify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 building experience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community build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一、緒論

社區為公民社會形成的基礎，而公民參與及社會發展更是以社區為起點，因此社區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環境息息相關（Rifkin 2014）。

隨著都市化區域的增加與程度的提高，都市社區的生活也產生極大變異，都市是一個高度流動、開放且充滿多重關係的組成（Bauman 2001），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人際關係低落，鄰里關係的崩解與疏離，社區內也缺乏共同體的觀念，更遑論凝聚社區民眾，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反之，若要全面性的促進社區發展，必須提供居民良好的生活空間，建立個人與所屬社區密切的聯繫，以發展出公民意識與社區認同，並促使社區民眾願意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林信廷等 2012）。

從台灣民主化的發展來看，台灣自黨禁開放、戒嚴令解除以來，人民基本權利如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等都獲得保障，各種資源開始從舊有的控制體系中釋放，帶出了社會運動，民眾也逐漸將焦點由政治領域轉向生活議題，也開始重視社區生活品質。然而，1960 至 1970 年代的社區政策大多集中在硬體設施的建設，雖興建不少社區活動中心及社區圖書館（施教裕 1999），但在軟體方面，對於激發出民眾公共問題意識、讓居民對社區事務關心的部分仍有限，特別是缺乏民主生活的參與，以及由下而上的溝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於 1994 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其目的為強調營造社區感、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透過凝聚社區內的共識、共同參與的方式，進行一連串生活問題的解決（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2005；曾旭正 2007）。

此外，由於社區營造也強調由下而上的決策與行動過程，在實務上如草根性民主、培力、公共性等概念一直不斷在社區被操作，使社區成爲一個政治實踐的場所，重視居民的參與性，非但成爲公民社會實踐的基礎，也使社區成爲近年來研究的重要標的。比如說：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各地的推動，是社區發揮民主參與精神最主要的實踐形式之一，透過公民之間的辯論與協商過程，予以參與公共資源決策分配

的機會，讓公民對於資源的支用扮演更直接的角色（徐仁輝 2014）。由此可見，基層民主的推展，最主要的還是社區居民對社區有一份集體的情感與共同意識，願意透過參與讓社區更為美好，然而無論是集體意識或是參與行為，都是因為社區營造對社區環境民主化與公共化的積累所紮下的基礎。

社區總體營造的主體是社區內的居民，都市社區中疏離的人際關係，並不容易促成集體的意識與參與，因此社區營造除了喚起基層的民主參與意識，更重要的是改善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關係與人際互動，藉此強健 Putnam（1993）眼中的社會資本，並透過累積豐沛的社群社會資本促成社區集體的公共意識與參與。換言之，現今人們即使住在同一個社區，但互動的缺乏導致溝通孱弱，致使人際間的關係連帶與信任相當薄弱，社群的社會資本無法累積，更遑論解決社區集體的目標。多數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即是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的關係網絡，藉由關係網絡的運作，以達到互利或共同的目標（Borgatti 1998; Burt 1992, 1997; Coleman 1990; Lin 2001; Portes 1998），社區內社會資本的積累則有利於促成社區集體的目標。在 Putnam（1993）對基層民主和社會資本的研究當中，均認為社會網絡能強化居民對社區的認同與共識，同時促使居民參與集體行動（Perkins and Long 2002）。以 Wallace et al.（2017）社區研究為例，居民會利用日常生活中社會關係的交織，創造當地社會凝聚力，並投入對社區的承諾或其他資源，藉以發展對當地有價值的利益，亦能促進當地居民自願參與社區活動。據此，社區為基礎的研究已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對社區行動與發展的關懷也是目前社區營造最主要的政策目標，但在學術上至今仍缺乏系統性的分析與研究，因此本研究第一個研究目的與問題，便是要探討居民間社會網絡和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之間的關聯性。

再者，雖然預期上居民間的關係網絡較為緊密，會具有較大的能力去組織及有效集體行動，凝聚社區意識，促成社區集體發展（黃源協等 2010）。但社區營造經驗有無之間所造成的差異，卻缺乏經驗性的比較與討論。雖然社區營造已歷經 20 餘年，在台灣各地已展現諸多的成果，也有將近 7,000 個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但並非所有社區均有進行社區營造，也並非是所有的社區發展協會皆是積極投入社區營造的運作與經營。根據各縣市政府文化局統計，目前僅粗略有 1,379 個社區施行營造政策，占全國社區 22.19%，可見大多社區仍未實行營造計畫。¹ 據此，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與問題，便是要透過不同營造經驗社區的樣本進行比較性的驗證，檢視社區營造的效果是否對居民的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參與造成顯著正向的影響。

最後，社區居民社會關係的測量在方法上的討論與挑戰，也是本研究主要的動機與目的之一。社區人際網絡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重要影響，但過去研究對於社區內人際關係網絡的測量，大多還是以李克特量表的認知測量為主，反映的是對關係的想像，而非實際的關係（黃源協等 2010；黃源協等 2011；王光旭 2015；Bullen and Onyx 2005 [1998]; Harpham et al. 2002; Oorschot et al. 2006）。比如說：黃源協等（2010, 2011）測量社區內人際關係的量表，是透過詢問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 8 題有關社區人際關係好壞的題項，並採取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5 點尺度進行測量，測量的是對於社區居民往來與關係和諧的印象，而非關係的規模、強度、互動內容等面向。在關係研究的操作化上，透過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可進一步分析受訪者與社區成員是否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區隔強弱連帶，信任程

1 本資訊來自於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及相關單位公布資料的加總。

度，並對關係進行更細緻的分析與討論；此外，目前國內有關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的研究成果，多從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或總幹事的角度檢視，以社區為分析單位進行調查，非以居民本身為調查對象來反映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參與情形（黃源協等 2010；黃源協等 2011；張德永等 2012；劉麗雯、林雅俐 2015）。為此，本研究企圖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並以社區居民為主要調查對象，將居民社會網絡進行操作，並以此來探討本研究主要變數間的關聯性。

二、文獻探討

（一）社會網絡的定義與測量

網絡這個概念自古有之，並存在於我們四周，不論是在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間或國與國之間，只要有兩個以上的行動單位互動所形成的關係，便是一種網絡的互動關係。Mitchell（1969）定義社會網路乃是一種社會結構，至少包含三大要素：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連結途徑，因此社會結構也可以進一步定義為位置或節點間聯繫的形式。關係的強弱可分為強連帶（strong ties）及弱連帶（weak ties）。Granovetter（1973）認為強連帶通常會在相似群體或組織內建立起來，所得到的訊息重複性較高；弱連帶則是屬於相異群體之間的連結，所負載的訊息異質性較高。因此兩種不同連帶在人與人、組織與組織，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將發揮不同的作用。

社會網絡的分析觀點除了重視個體所形成的社會關係，也關注社會關係所交換的資訊與資源，以滿足個體需求，同時獲得日常生活的協助、訊息與支持（Sauer and Coward 1985）。黃光國（1988）認為華人在進行資源交換時，基於文化特點以關係判斷做為考量，並將對關

係的認知分類為三種：情感性、工具性與混合性關係，依對方所歸屬的類別，以不同的法則與之交往。情感性關係，通常是指個人與家庭、親友間的關係，以滿足關愛、溫情、安全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法則；工具性關係則是個人為了獲取某種資源，和他人所建立的關係，即所謂中國人的公平法則；而混合性關係是個人和親戚、朋友等熟人之間的關係，採用人情法則來維持與經營關係。從更為功利的角度來說，Lin（1999）認為社會網絡的形成是為了取得他人資源、經濟上的協助，或是尋求情感、心理上的依靠，因此透過具體的人際互動，進而與他人建立人際關係。另一方面，Coleman（1990）認為信任是網絡運作的主要要件，透過人與人之間往來聯繫，啟動人際間的信任感，創造彼此相互合作的意願，更有助於個人與集體社會資本的累積。

網絡分析依據研究目的及資料收集方式之差異，大略可分成兩種類型：一為整體網絡；二為自我中心網絡（王光旭 2015；Andrew and Feiock 2008；Knoke and Yang 2008；Wasserman and Faust 1994）。整體網絡的網絡分析是以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關係個體為調查對象，調查彼此間的關係連帶，並透過計算了解其分布的位置與密度，以及關係的形態；自我中心網絡分析的重點，為個人在網絡中的連帶與位置，並向外擴散成以自我為中心的網絡關係形態，其可推論到大範圍的母體，兩者均常被討論及應用（王光旭 2015；Lin 2001；Mitchell 1969）。

同一社區的居民間較陌生人容易產生親近的連結關係，可依賴彼此提供情感和工具性的支持，居民間的社會互動則有賴於彼此間關係網絡的結構形態（呂寶靜 2012a）。從對關係的操作上來說，本研究欲採用黃光國華人社會關係理論為基礎，測量社區居民的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社區居民間情感性的互動基於需求法則，較容易培養出強連帶、親密的互動關係，有利於社會整合，融入社群，獲得社會支持；

居民工具性的互動基於公平法則，較容易從事精打細算（calculation）的理性行動，也較為偏向異質性的互動關係（黃光國 2001）。另一方面，社區是以地理區域所框定的（Mattessich and Monsey 1997），亦具有清楚的範圍，照理說應適合整體網絡進行普查，但因個資法較難取得完整精確的地址名冊，且一個社區動輒上千位居民，也難以進行普查，因此本研究從母體中抽取部分個體，透過自我中心網絡的研究設計，並結合提名法（name generator）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期了解社區居民的社會網絡狀況與特徵。提名法要求研究參與者逐一列出強連結網絡的成員，其人數即為網絡規模，並在 1985 年成為美國基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的題組，台灣則於 1997 年社會變遷調查中採用。

而在社區居民網絡的調查之中，目前以 1997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之社會網絡與社區組問卷最為完善，其題項設計結合社會聯繫、關係網絡的概念與個人的社區、社團及社會支持等面向，測量的關係面向為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瞿海源 1999；熊瑞梅 2001）。此外，「混合性網絡」在概念上涵蓋了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的元素，在陳介玄（1994: 230）的界定中是最能代表台灣社會人際互動的模式，但其也認為混合性關係語詞本身指涉較為籠統而模糊，並不能傳神的將台灣社會運作的獨特秩序原則表現出來，在測量的操作化上也有其困難度（陳介玄 1994）。因此，本研究以前述 1997 年社會變遷的題項設計為參考基礎，將社會網絡的測量區分為情感性網絡與工具性網絡兩部分，受訪者可在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的問項填入至多五位在一年內具有密切互動的對象，藉此了解受訪者社區內的網絡規模與範圍，並進一步追問這些對象為何種關係、互動模式與頻率等。

由於社會網絡的測量不易，過去多位學者在進行網絡研究時，認

為信任是社會資本運作的一項重要指標，能彰顯出社區人際關係的品質，而關係品質也正是社會網絡的內涵（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Tsai and Ghoshal 1998），因此本研究也加入對社區居民的信任做為衡量居民間網絡關係的指標。

（二）社區意識的定義與測量

社區除了地理區域或結構空間的關係外，居住成員往往會對其產生出一種特殊的情愫，多被稱為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SOC），在建構社區發展及營造政策上為相當重要的環節。McMillan（1996）將社區意識定義為一個歸屬在一起的精神、一種權力結構能被信賴的感覺、一種互相獲利的社交經濟，以及一起獲得共同利益的經驗分享。Hahm et al.（2016）發現居民會隨著社區意識，一起創造、學習，並分享社區共同體的價值，強化社區參與及發展。黃富順（1994）認為社區意識是一種歸屬感，歸屬感是來自社區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服務、問題、需求以及居住環境，進而形成共同意識，此為社區建設的原動力，也是社區發展的基石。徐震（1995）則將社區意識定義為居住於某地區的居民對此地區及鄰人有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與融合，包含了社區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與社區情誼（community feeling）。也就是，當居民之間有著相似的情感知覺，彼此間信賴感的提高且社區結構穩定時，有助於社區居民形成強烈的認同感（Sarason 1974; Vaske 2001）。

若從認同的角度來說，Castells（2010）指出社區認同是建立於個人或單一文化做為基礎的社會化過程，透過社區行動者將此過程轉換為對於社區的意識與認同。然而，社區認同也是居民樂於參與社區的主要心理因素，假若個人參與程度越高，代表其對社區的認同越高，

顯示該社區居民具有高度的社區意識，進而促進人際關係的情感連結，更能凝聚社區的共識（林瑞欽 1994；Abbott 1995）。

綜上可知，大多學者所定義的社區意識都著重於社區歸屬感及社區認同兩個元素（郭瑞坤等 2013），故本研究對社區意識的概念型定義也奠基於此。

而在測量方面，社區意識是一種抽象的心理現象，為此美國心理學家 Thomas Glynn 在 1981 提出「心理社區意識」（或翻譯為社區感）（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SOC），以李克特量表的設計探討社區居民對社區環境認知的描述同意程度，將社區意識研究帶入了可測量的領域（郭彰仁等 2010）。Buckner（1988）則認為社區意識包含了不同層面的概念，其因此建立了鄰里吸引力、鄰里互動關係，及社區心理感三個面向的鄰里凝聚量表（neighborhood cohesion instrument, NCI）。Hahm et al.（2016）則將社區意識的測量分為五個項目：社區指標、社區規模、領土意識、社區組織與心理感覺。

基於生活環境的變遷及社區意識對社區發展的重要性，又加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動，林瑞欽（1994）從社區認同、社區關懷、社區參與及社區親和與疏離等四個分量發展了一份本土化的社區意識量表，這算是第一份以台灣本土社區為研究標的而設計的社區意識量表。而陳香妃等（2007）則認為社區意識主要是指居民對地方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並認為社區凝聚力才是測量社區意識的主要測度指標。

此外，從居民間關係的角度來說，社區意識與鄰里關係具高度關聯性，因此也有社區意識量表的設計包含鄰里間關係（Ahlbrandt 1984; Chavis and Wandersman 1990; Prezza et al. 2001; Skjæveland et al. 1996; Unger and Wandersman 1983）。Oh（2003）提出鄰里連結做為社區意識的主要的概念之一，並透過友誼、社會凝聚與信任、非正式的社會

控制、鄰里參與等四個面向對社區意識進行測量。Wood et al. (2010) 則以鄰里間所感受到的交換、諮詢及友情來衡量社區意識。此外，台灣學者亦有參考 Glynn (1981)、Buckner (1988) 的量表，將題項整合做為社區意識的測量工具 (黃源協等 2007；郭瑞坤、王春勝 2004；郭瑞坤等 2007；李俊豪 2008, 2010)。

綜合以上觀點，社區意識的測量大多以社區歸屬感及社區認同為基礎，而過去的衡量方法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國內學者在施測時，也大多參酌國外學者的量表，故本研究參酌郭瑞坤等 (2007) 所設計的社區意識量表，以期呈現居民社區意識的狀態。

(三) 社區參與的定義與測量

社區參與是由社區主義者所提出，並將參與的核心、議題與行動從全國性縮小到地方性的範圍，其依據民眾所關注的生活議題做為起點。因此，社區參與可視為具有草根性與務實性的自發性活動 (丘昌泰等 2002)。夏鑄九 (1999) 亦認為社區參與是草根民主的一種機制，透過草根性組織釋放參與力量，平衡地方政府的體制，進而轉化為國家的政策。Rifkin (2014) 將社區參與視為一種社會過程，居民透過參與過程學習、交換資訊，讓公民社會更為完善。

然而，參與的意涵很廣泛，廖俊松 (2004) 認為一個完整的參與應包含參與的主體、範圍、過程、目的以及權力競合等各面向的表現。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UNCHS 在 1983 年曾提出四種主張解釋社區參與：(1) 社區參與是一種權力；(2) 社區參與必須延伸至生活的全部領域，包括共享社區發展的利益；(3) 社區參與是一個達到計畫結果的方法，其目的是為了提升社區良好的居住情況；(4) 社區參與可促進社區計劃的實行。此外，社區參與是社區主

要的行動方式，居民藉由參與社區中的活動，來表達其對社區事務的關切（蔡宏進 1985）。而施教裕（1997）認為社區參與的旨趣在於有目標、組織性和行動的過程及投入，並結合社區成員的共同利益，以凝聚社區居民的意識，提昇社區生活品質，或設法解決社區所面臨的難題。

另一方面，社區參與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及參與程度來呈現。Janelle Plummer 與 John Taylor 於 2004 年在中國社區的研究中，參酌 Arnstein（1969）公民參與階梯的概念，以告知、出席、表達、討論、決策、倡議與自我管理六個層次，探討居民的參與程度，由低到高分述如下：

1. 告知為最低層級的參與，僅是告知社區成員可能影響他們的相關政策或計畫。
2. 出席是指社區成員能夠出席會議，但行動的決策已事先被決定。
3. 表達指社區成員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與觀點，並分享相關資訊與知識，試圖影響行政當局的決策。
4. 討論指在社區行動最初的階段，成員能夠給予想法上的討論，以他們的理念與想法來影響最終的決策。
5. 決策係指社區居民能夠對於影響他們的事務做出決定。
6. 倡議與自我管理為最高層級的參與，社區成員能夠依自身理念與想法而行動，並動員社區固有的資源來達成目標。

進言之，不同參與層次的區分，一方面彰顯社區參與有其不同階段性的發展過程，亦蘊含著居民對切身事務影響程度多寡之意涵。因此，將社區參與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助於我們對參與程度和形態有更深層的瞭解，進而勾勒出社區參與的具體樣貌（林信廷等 2012）。

針對社區參與的測量，目前並沒有一套標準的量表（郭彰仁等 2010），而大多研究者依其研究需求與文獻自行發展衡量社區參與程度的量表（Simplican et al. 2015）。Bagnall（1989）將參與程度分為出席、涉入與控制等三個部分。而 Burns and Taylor（2000）運用地方社區參與歷史、社區參與過程中夥伴關係建立策略的品質、組織協力社區參與的能力、社區有效參與的能力以及社區參與所帶來的影響等五面向，來衡量一個社區的參與情形。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黃源協等（2010）和林信廷等（2012）參考 Plummer and Taylor（2004）公民參與階梯的概念，以告知、表達、行動、決策與倡導等四個參與階梯，對社區參與程度的主觀認知進行測量。

另一方面，若從行為測量的角度來說，Ohmer and Beck（2006）的量表以出席會議、參與和討論、協助組織的工作、擔任委員會成員、幹部、其他社區委員會主席、招募新會員及擔任其他社區組織代表等八個面向，來衡量社區居民的參與頻率。

綜合上述觀點，可發現目前社區參與的量化測量可分為兩大類：一為測量參與程度的主觀認知（黃源協等 2010；紀貝臻 2011；Bagnall 1989）；另一則為測量實際參與頻率（郭彰仁等 2010；Ohmer and Beck 2006）。據此，本研究認為若只以單一標準進行測量，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居民社區參與的情形，故本研究擬分別採用 Plummer and Taylor（2004）所提出之社區參與程度認知與 Ohmer and Beck（2006）居民的參與頻率做為操作化社區參與量表的基礎，以期更能準確地表達居民的社區參與情況。

（四）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關聯性

Nasar and Julian（1995）研究證實了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間

的正向關聯性：社區意識與社區鄰里知道彼此的名字、認同彼此為朋友的人數（規模）呈正相關，無論是情感或工具性關係，均有利於拓展鄰里關係，強化與個人與社區之間的整合。比如說當居民感受到其他社區成員的社會和情感支持，以及滿足需求感覺，並產生社會關係與人際互動，進而引發他們的社區意識；而當居民提供物質幫助（工具支持），則有助於社區的網絡連結，加強對於社區的認同感（Chaskin 1999; Farrell et al. 2004; Nurullah 2012; Obst and White 2007; Smith 2011）。同時，有學者也認為信任是人際關係中重要的社會資本，它促進了資源交換或知識共享等意願行為，並有助於社區居民間的關係更為融洽，以發展更強烈的歸屬感（Zhao et al. 2012）。

此外，Coleman（1990）的研究曾指出，緊密的社會連結可促使個人目標實現、動員所需資源。從集體行動的角度來說，社區鄰里間的情感性與工具性的交流，有利於居民融入社區，亦能強化對社區的認同與義務，進而累積社區的社會資本（呂寶靜 2012a, b；羅家德 2014）。總而言之，綿密且高品質的情感與工具性網絡有助於社區居民彼此間的連結，強化彼此的互動與整合，累積社區共同意識，促成集體的行動與合作，進而協助社區的成長和發展；相對地，若缺乏連結關係，將有損社區之凝聚，或造成人際疏離的現象，自然也就無法發揮有利於社區集體的綜效（Halpern 2005; Kay 2006; Narayan 1999; OECD 2001）。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

H1：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H1-1：居民間情感性網絡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H1-2：居民間工具性網絡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H1-3：居民的社區信任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

社區參與是社區發展不可或缺的運作核心，不僅需要有形資源的投入，更須以無形的人際網絡做為基礎。Gilchrist (2004) 指出社區內的網絡關係不僅能加強彼此的溝通與對話，更是促進集體行動的有利條件，讓居民願意為改善社區生活的共同目標一同努力。羅家德 (2014) 針對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分析，也證明了居民間的情感與工具性網絡對災後村落重建工作的集體行動產生正向效果。換句話說，若社區成員透過共同關係形成、情感連結或交流，物質的相互扶助，將促使居民更加重視社區，更有可能參與社區活動 (Butler et al. 2002)。從功利的角度來說，社會網絡也可以成為居民重要的社會資源，提供其他成員的生活救濟 (如金錢或物資之協助)，進而產生緊密的連結，有助於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並努力解決公共問題 (Li et al. 2015)。同時，信任也是社區運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藉由居民間彼此誠實、團結且相互關心的互動，較容易激發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動力 (江大樹、張力亞 2016)。

總的來說，社區居民間關係的維繫，較容易促進成員的熟識和瞭解，更能透過共有情感基礎與價值認同所導引的社區參與行動，深化社區居民彼此間的信任關係，進而創造並蓄積社區的社會資本 (林信廷等 2012)。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與假設三：

H2：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2-1：居民間情感性網絡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2-2：居民間工具性網絡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2-3：居民的社區信任對社區參與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3：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H3-1：居民間情感性網絡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H3-2：居民間工具性網絡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H3-3：居民的社區信任對社區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影響

（五）社區總體營造經驗差異之調節效果

文建會所推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其核心為重建人與人的關係網絡，凝聚社區共識，並進行生活問題上的解決，營造社區成為公共化與民主化的生活環境。換言之，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全面改造居民互動、文化地貌、景觀環境和生活品質的長期工程，主要目的是要改變居住在土地上人的觀念，激發他們生活共同體的意識，引導其透過社區參與的民主方式，願意自動自發地改善社區環境與生活，營造社區文化特色，並重建人與人，及人與環境的親密關係（陳錦煌 1999）。林雅真（2008）針對彰化縣社區營造經驗的研究，認為社區營造能促使社區鄰里發展出緊密的社會網絡，凝聚社區居民的共識，在營造過程中，居民可經由實際參與增進彼此互動，強化社區認同感與社會關係，進而厚植社區的社會資本，也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經營。從國外的研究經驗來說，社區總體營造被視為是社會持續互動的重要過程，透過居民間溝通協調、社區相互配合和信任，促進社區意識的建立，亦促使居民願意參與社區共同的事務與發展目標（Ruiz-Ballesteros and Cáceres-Feria 2016）。而社區總體營造為一種在地行動的過程，透過促進鄰里間的協調行動來努力改善當地資源運作，確保居民日常需求，並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Bhattacharyya 2004）。據此，社區總體營造活動的投入對社區居民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正向的效果，有社區營造經驗的社區更能發展出綿密的人際互動關係，強化社區意識的凝聚，並轉化為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動力，形塑草根民主，進而建構一個自主、參與且永續發展的公民社會（江大樹、張

力亞 2016)。

總的來說，社區營造的過程與成果可能影響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促使居民更加融入社區生活，建立人際關係互動網絡，獲得情感與工具性的支持，強化社區居民的認同感、發揮更大的集體力量，透過居民自主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讓社區營造能持續發展（黃源協、劉素珍 2009；楊桂珍 2009；黃源協等 2010；蕭揚基 2015）。因此，相較於沒有營造經驗的社區，社區營造的經驗會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社區參與之關係帶來正向增強的調節效果（溫忠麟等 2005）。
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與假設五：

H4：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之影響具正向增強調節效果

H5：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之影響具正向增強調節效果

H5-1：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程度之影響具正向增強調節效果

H5-2：社區營造經驗對居民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頻率之影響具正向增強調節效果

（六）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理論與實證研究，依照前述的研究假設，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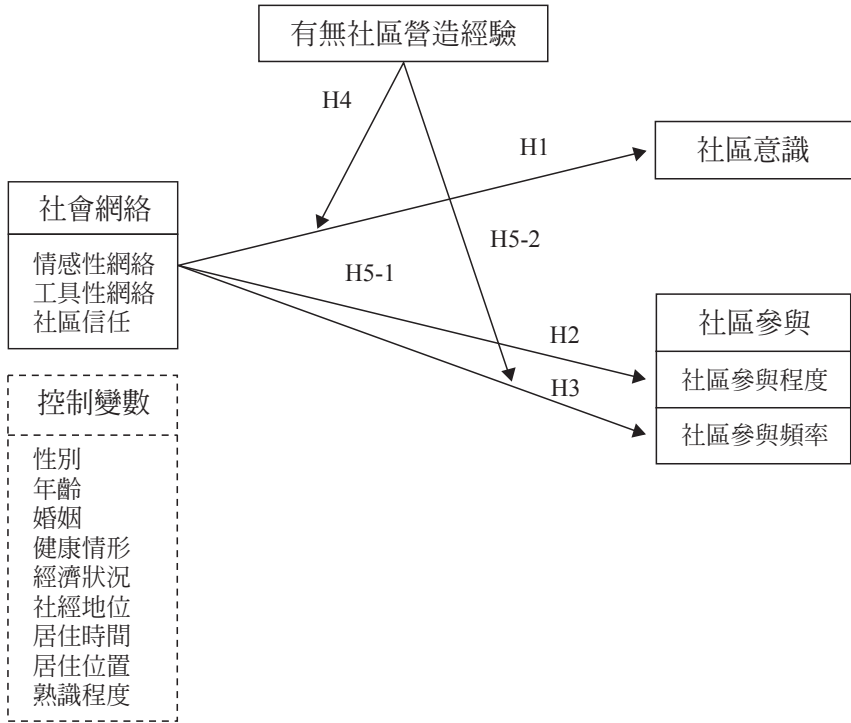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施測程序與研究樣本

根據內政部於 1991 年「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社區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就本研究就來說，台南市銀同里、五妃里與社區主管機關所劃定的地理範圍相同，銀同里也大多被稱為銀同社區，五妃里亦然，故適合做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範圍。選定銀

同里、五妃里的理由有三：第一，都市型社區人際關係較為疏離，社區意識低落，相較於鄉（農）村型的社區，更容易看出社區營造對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效果；第二，銀同里運用社區自有資源，充分結合在地人力，營造出健康、安全、舒適之生活環境，並獲得由行政院環保署所舉辦「第 20 屆全國環境模範社區遴選活動」優等，亦獲選全國十大模範環保社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優等，在社區營造已有 10 年以上的經驗，相對來說，五妃里卻缺乏營造經驗，適合做為有無營造經驗的比對；第三，銀同里、五妃里皆位居台南市市中心，一方面適合用來做為都市型社區的代表，且在地理區域、人口特性、產業類別、社區規模具有相似性，兩者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皆為同一人，較容易控制社區營造經驗以外的影響因素。

依嚴謹的抽樣原理，本研究每個社區居民人數超過 1,000 人，亦是地區性的研究，若要進行問卷調查，適當抽樣樣本人數大約為 300 至 500 位 (Dillman 2000)。據此，本研究先從里長那邊取得全里的家戶資料，先透過系統抽樣抽取家戶樣本，並以一戶一人 (20 歲以上) 的戶中抽樣法，做為該家戶的代表樣本 (洪永泰 1996)，每一個里抽 300 位以上的里民，類似的抽樣規模與方法也在其他社區研究應用過 (廖培珊 2016)。

為求施測時能夠獲得較多的協助與支持，筆者從 2016 年 1 月就開始在兩個社區蹲點到 9 月，以了解社區的環境與人口分布，並與當地的居民和里長建立信任關係。本研究正式施測的時間為 2016 年 6 月至 9 月，透過作者親自面訪總計回收 644 份問卷，剔除面訪過程中不想繼續接受訪問而中止填寫的部分，有效問卷共計 642 份。以上的調查，為作者科技部計畫所補助的研究之一 (編號：MOST 105-2628-H-024-001-SS2)，在研究倫理上也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倫理審查委員會

的研究倫理審查（案件編號：104-284），在調查過程中均恪遵研究倫理要求。

在人口統計特性方面，銀同里受訪者總樣本數有 325 位。男性有 128 位，占樣本數 39.40%；女性有 197 位，占樣本數 60.60%。在婚姻方面，有配偶者為 194 人，占 59.70%，無配偶者則為 131 人，占樣本數 40.30%；自評健康情形以普通居多，共 137 人，占樣本數 42.20%；社經地位以第五等（最低）人數最多，共有 124 人，占樣本數 38.20%。此外，住家位置距離社區辦活動（里辦公室、活動中心）的地方，以自覺非常近的比例最多，共有 105 人，占樣本數 32.30%；與里長熟識程度，以非常熟識最多，共有 110 人，占樣本數 33.80%。

五妃里受訪者總計有 317 人，當中男性有 121 位，占樣本數的 38.20%；女性則有 196 位，占樣本數 61.80%。在婚姻狀況，有配偶的受訪者為 152 人，占 47.90%，無配偶則為 165 人，占樣本數 52.10%；自評健康情形以普通居多，共 144 人，占樣本數 45.40%；社經地位以第四等人數最多，共有 128 人，占樣本數 40.40%。此外，住家位置距離社區辦活動（里辦公室、活動中心）的地方，以自覺有點遠的比例最高，共有 128 人，占樣本數 40.40%；與里長熟識程度，在五妃里以完全不認識最多，共有 104 人，占樣本數 32.80%。以上資訊請參閱附錄 1。

（二）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的設計上，本研究以前述文獻為基礎，進行概念化與操作化。在問卷初稿完成後，先將問卷給予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專家學者、社區輔導員等共五位協助進行專家效度檢核，初稿修正後，再到台南市仁德區上崙里進行前測問卷的面訪，透過便利抽樣

的方式共回收 104 份問卷。繼之根據面訪問卷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並依據前述分析結果修正問卷後進行正式施測。正式施測之後，回收的問卷本研究再進行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以確保研究工具能達到嚴謹信、效度之要求。

1. 社會網絡

本研究所指的社會網絡是社區居民互動關係情形，實際測量居民之間社會網絡的規模與品質，並將測量分為工具性以及情感性兩大部分，問卷題項以 1997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之社會網絡與社區組問卷為基礎，並依照本研究的個案特性進行文字上的修改，包含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題目內容請參閱附錄 2。

在本研究中，居民社會網絡的測量上是採用居民社區內情感與工具網絡的規模，也就是依據關係連結的數量加以測量（陳美惠等 2008；趙延東 2011；羅家德 2014）。此外，雖然社區內情感與工具性關係親屬關係的比例並非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但親屬比例高，也反映了社區居民的情感與工具網的社會支持來源，並非來自於與社區鄰里互動所建立的非親屬人際關係，在討論社區營造的效果上有其重要意義，故本研究在進行描述統計與社區有無營造經驗的比較時，也會將此一變數納入分析與討論。

另一方面，針對社區信任的衡量，本研究根據王光旭（2016）的社區信任量表做為參考，並以社區的街坊鄰居、里長、志工或服務幹部以及服務團體或組織做為指標，題目共計 4 題，受訪者依照題項描述選擇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為 1 分至 5 分。正式施測時，為檢驗本正式問卷的效度，本研究再次以因素分析考驗問卷之效度，其解釋變異量為 85.81%，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 以上，顯示問卷每個題項均能有效測量社區信任。從信度來看，社區信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為 0.94，顯見本問卷在社區意識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社區意識

本研究社區意識題項設計主要參考郭瑞坤等（2007）的社區意識量表，並依照本研究個案的脈絡與特質進行適當的文字修正，量表總計有 12 題。在選項設計上，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受訪者依照題項描述來選擇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為 1 分至 5 分。在正式問卷因素分析，結果 12 題萃取了一個因子，解釋變異量為 59.70%，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 以上，顯示每個題項均能有效測量社區意識。從信度來看，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 為 0.93，顯見本社區意識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題目請參閱附錄 2。

3. 社區參與

本研究在社區參與的測量，採用兩種方式，第一種為測量居民對參與程度的認知；第二種則測量參與頻率。在社區參與程度的題項，本研究以 Plummer and Taylor（2004）所提出社區參與階梯做為主要架構，並參酌了紀貝臻（2011）操作化的題項，將社區參與分為告知、出席、表達、討論、決策與倡議等六種參與程度，衡量居民社區參與的程度共計 10 題。在選項設計上，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受訪者依照題項描述來選擇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為 1 分至 5 分。在針對社區參與程度的因素分析中，並未如 Plummer and Taylor（2004）原始量表將參與呈現出階梯的狀況，而是全部的題項整合成一個因子，其解釋變異量為 77.62%，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0 以上，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 為 0.96，顯示社區參與程度的題項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社區參與頻率則採用 Ohmer and Beck（2006）的文獻為基礎，另參酌李維貞（2013）操作化的題項，依照本研究的實際情形進行適度

調整，衡量居民8種社區活動參與的頻率，分別給予1分「從不參加」到5分的「總是參加」。本研究亦對社區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各別進行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亦萃取了一個因子，其解釋變異量高達85.66%，每個問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0.50以上，整體信度為0.97，顯見社區頻率量表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題目也請參閱附錄2。

4. 控制變數

而社區意識的研究中，林瑞欽（1995）依其實證研究認為，年齡越大的居民住在社區也越久，他們對社區的變化也較瞭解，自然對社區較有深厚的感情，亦會有較強的社區意識。因此年齡與在社區居住的時間，對社區意識有正向的效果。

從Nasar and Julian（1995）研究結可發現，已婚者及有小孩的夫婦會有較高的社區意識。此外，Kim（2007）認為居民屬性（年齡、性別、收入等）與地方特性能促進社區意識多樣性的形成。另外，Lo and Jim（2010）發現年齡越低，以及從其他地方遷入者，其社區意識較為薄弱；Lewicka（2010）則發現年齡、學歷、性別、居住時間、家庭規模與住宅形態對社區意識有直接的影響。此外，紀孟君等（2011）更指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透過舉辦活動，進而與社區居民建立互動交流的管道與情誼，在強調人情關係的華人社會中，理事長與居民關係緊密，非但有利於居民配合社區發展協會活動的意願，具體反映在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上，也能提高「我群」（like-me）的社區意識。

在社區參與的研究中，陳茂祥（1985）認為收入會影響居民的參與，舉例來說，高收入者通常教育程度、職業種類、地位較高，因而在參與社區活動時，可享有較優的報償；相反地，低收入者需花較多時間在謀生工具上，較缺乏時間參與社區的事務。而居住在該社區時間亦影響社區活動參與，居住時間越長，社區認同度越高，對社區事

務越關切，進而有較高的參與意願（林勝義 1990）。

再者，Oh（2003）則針對一項老年鄰里社會連結的研究，發現（1）居住時間長短會影響鄰里地方組織參與的機率；（2）男性比女性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可能性愈高；（3）已婚、高教育、高收入者參與的可能性愈低；（4）相較於房子非自有者，房屋自有的老人參與社區事務的頻次較低。Xu et al.（2010）在測量社區政治參與發現，老年人、已婚、具有小學以上的教育程度者，參與社區事務的比例較高，甚至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主動去投票；Chen et al.（2013）則發現教育程度越高、已婚以及容易獲得訊息者都有強烈的參與意願。Sun and Zhang（2015）在低碳城市建設的研究，發現性別與年齡會對社區參與有顯著影響。另外，Sundar et al.（2016）更指出當居民自覺健康狀況越好，對社區參與動機越強、參與程度越高。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控制變數的部分，將以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健康狀況、經濟狀況、社經地位、居住時間、居住地點與社區活動舉辦地點的距離，和里長間的熟識程度等變數對模型進行控制效果的檢驗。在操作化上，性別是透過男女的選項測量；年齡則是直接請受訪者填寫出生年，再進行計算；婚姻是透過名目尺度的選項請受訪者進行勾選；自評健康情形的測量從非常差至非常好為 1 至 5 分；經濟狀況是透過名目尺度的選項請受訪者進行勾選；社經地位則是透過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的名目尺度之選項做為衡量標準，依評價的高低排列成五個等級，給予 1 至 5 的分數，1 為社經條件最好，5 為最差（林生傳 2005；Hollingshead 1957）；居住時間是直接請受訪者填寫居住時間，再進行年數的轉換；居住位置則是以受訪者的住家位置至社區辦活動的地方（如，里辦公室、活動中心）之主觀遠近進行測量，從非常遠至非常近為 1 至 5 分；而與里長熟識程度是直接以完全不認

識至非常熟識為 1 至 5 分進行測量。

四、研究結果

(一) 有無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差異性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1，結果發現：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在居民社區情感網絡的規模上有顯著差異 ($t=-2.43, p<0.05$)，有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情感網絡規模 ($M=1.44, SD=1.57$) 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M=1.13, SD=1.62$)。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工具網絡規模上也有顯著差異 ($t=-2.16, p<0.05$)，有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工具網絡規模 ($M=1.32, SD=1.43$) 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M=1.06, SD=1.63$)。另一方面，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在居民情感網來自親屬的比例上有顯著差異 ($t=-1.88, p<0.05$)，有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情感網絡比例 ($M=0.68, SD=0.41$) 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M=0.59, SD=0.44$)；而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工具網來自親屬比例則無顯著差異 ($t=-0.28, p=0.73$)，有營造經驗社區居民的工具網親屬關係比例 ($M=0.66, SD=0.42$) 與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M=0.65, SD=0.42$) 的差異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來自親屬的社會支持也大概占了六成五左右。由以上結果可發現情感網與工具網中的對象是親屬的占大多數 (平均數大於 0.50)，顯見社區鄰里間的情感與工具性支持大多還是依靠親屬，只有不到四成的比例依靠非親屬人際關係。

而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信任上有顯著差異 ($t=-8.60, p<0.001$)，有營造經驗的社區信任 ($M=3.70, SD=0.91$)，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 ($M=3.08, SD=0.91$)。上述的結果初步證實了在都市型

表 1 有無營造經驗社區在各主要變數之 T 檢定

	有無營造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無	317	1.13	1.62	-2.43*
	有	325	1.44	1.57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無	317	1.06	1.63	-2.16*
	有	325	1.32	1.43	
情感親屬比例	無	152	0.59	0.44	-1.88*
	有	203	0.68	0.41	
工具親屬比例	無	144	0.65	0.42	-0.28
	有	199	0.66	0.42	
社區信任	無	317	3.08	0.91	-8.60***
	有	325	3.70	0.91	
社區意識	無	317	2.91	0.74	-7.79***
	有	325	3.36	0.72	
參與程度	無	317	2.26	0.77	-3.70***
	有	325	2.51	0.94	
參與頻率	無	317	1.80	0.87	-5.92***
	有	325	2.30	1.24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的社區中，有無營造經驗社區裡居民的社會關係網絡具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有營造的地區很明顯的居民彼此間的關係規模與品質都優於沒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

此外，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意識上有顯著差異 ($t = -7.79, p < 0.001$)，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其社區意識 ($M = 3.36, SD = 0.72$) 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M = 2.91, SD = 0.74$)。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社區參與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t = -3.70, p < 0.001$)，

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參與程度 ($M=2.51, SD=0.94$) 也明顯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的社區 ($M=2.26, SD=0.77$)。不同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在參與頻率上也有顯著差異 ($t=-5.92, p<0.001$)，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頻率亦是 ($M=2.30, SD=1.24$) 大於缺乏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 ($M=1.80, SD=0.87$)。上述分析的結果，也初步顯示了居民的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會因有無營造經驗而有所差異，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確實在集體意識與參與能量都高於沒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

綜合前述 T 檢定的分析結果與討論，都市型社區中社區營造的投入對居民間的連結，與社區生活的整合，以及社區發展的活絡，均造成了正面的影響。

(二)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的結果如表2所示，從每個變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來看，都市型社區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平均規模是 1.29 位，工具性網絡的規模是 1.19 位，情感性網絡比工具性網絡的規模稍大。從社區信任來看，高於中位數，顯見受訪者對社區鄰里的信任是抱持較為正面的態度。另外，不論是社區參與程度認知的平均數 (2.39) 及參與頻率 (2.05) 皆低於中位數，顯示從主客觀來說都市型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較為低迷。社區意識 (3.14) 則反映出中間偏高的情形。

就個人背景而言，性別與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有顯著的負相關 ($r=-0.09, p<0.05$)，對參與程度有顯著的正相關 ($r=0.11, p<0.01$)，顯示男性居民情感性網絡的規模較女性小，但社區參與的程度較高。年齡與社區信任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r=0.38, p<0.01$)，對社區意識 ($r=0.40, p<0.01$)、參與程度 ($r=0.24, p<0.01$) 及參與頻率 ($r=0.25,$

$p < 0.01$) 也是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居民年紀越長者，對社區的信任越高，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也較高。而有配偶與社區信任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0.22, p < 0.01$)，對社區意識 ($r = 0.27, p < 0.01$)、參與程度 ($r = 0.16, p < 0.01$) 及參與頻率 ($r = 0.11, p < 0.01$) 也是顯著的正相關。經濟狀況則與參與程度 ($r = -0.08, p < 0.05$) 及參與頻率 ($r = -0.14, p < 0.01$) 有顯著的負相關。社經地位與社區信任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0.14, p < 0.01$)，對社區意識 ($r = 0.20, p < 0.01$)、參與程度 ($r = 0.21, p < 0.01$) 及參與頻率 ($r = 0.23, p < 0.01$) 也是顯著的正相關，顯示社經地位越低，對社區居民的信任程度越高，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也會比較高。

此外，就居住條件而言，居住時間與居住位置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0.17, p < 0.01$)，與里長的熟識程度也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0.43, p < 0.01$)，在社區住得越久，與里長之間的熟悉程度越高。住家位置與里長的熟識程度呈現有顯著正相關 ($r = 0.34, p < 0.01$)，顯示住家位置若與社區辦活動的地方（如：里辦公室、活動中心）越近，與里長的熟識程度則越高。居住時間亦與社區信任呈現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0.27, p < 0.01$)，對社區意識 ($r = 0.34, p < 0.01$)、參與程度 ($r = 0.27, p < 0.01$) 及參與頻率 ($r = 0.29, p < 0.01$) 也是顯著的正相關，在社區住得越久，就會越容易把自己當成社區的一分子，更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住家位置與社區信任 ($r = 0.24, p < 0.01$)、社區意識 ($r = 0.23, p < 0.01$) 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與里長熟識程度與對社區信任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r = 0.54, p < 0.01$)，對社區意識 ($r = 0.52, p < 0.01$)、參與程度 ($r = 0.31, p < 0.01$) 及參與頻率 ($r = 0.31, p < 0.01$) 也是顯著正相關，顯示與里長越熟識，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程度和頻率均越高。

從解釋變數來看，社區居民情感網絡的規模與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表 2 各變項敘述統計值與相關係數矩陣 (N=642)

變數	敘述性統計量			A1	A2	A3	A4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控制變數							
A1 性別	642	0.39	0.48				
A2 年齡	642	45.53	18.56	-0.03			
A3 婚姻	642	0.54	0.49	0.01	0.49**		
A4 健康情形	642	3.39	0.82	0.01	-0.16**	-0.00	
A5 經濟狀況	622	1.54	1.47	0.23**	-0.17**	0.09*	0.09*
A6 社經地位	642	3.94	0.95	-0.22**	0.37**	0.08*	-0.12**
A7 居住時間	642	29.51	20.68	0.12**	0.60**	0.20**	-0.10*
A8 居住位置	642	3.68	1.00	0.02	0.25**	0.11**	0.06
A9 與里長熟識程度	642	2.98	1.40	0.05	0.53**	0.31**	0.00
解釋變數							
B1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642	1.29	1.60	-0.09*	0.00	-0.02	-0.07
B2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642	1.19	1.54	-0.05	-0.02	-0.02	-0.05
B3 社區信任	642	3.40	0.96	0.06	0.38**	0.22**	0.00
結果變數							
D1 社區意識	642	3.14	0.76	0.04	0.40**	0.27**	0.01
E1 參與程度	642	2.39	0.87	0.11**	0.24**	0.16**	0.05
E2 參與頻率	642	2.05	1.10	0.07	0.25**	0.11*	0.0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 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 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相關係數矩陣

A5	A6	A7	A8	A9	B1	B2	B3	D1	E1	E2
-0.57**										
-0.13**	0.21**									
-0.03	0.04	0.17**								
-0.03	0.15**	0.43**	0.34**							
-0.06	0.04	0.03	0.11**	0.06						
-0.03	0.03	0.00	0.13**	0.04	0.81**					
-0.01	0.14**	0.27**	0.24**	0.54**	0.06**	0.06				
-0.04	0.20**	0.34**	0.23**	0.52**	0.08	0.06	0.75**			
-0.08*	0.21**	0.27**	0.07	0.31**	0.01	-0.04	0.40**	0.59**		
-0.14**	0.23**	0.29**	0.04	0.31**	0.07	0.01	0.36**	0.51**	0.70**	

有顯著的正相關 ($r=0.81, p<0.01$)，顯見華人社會中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有某種程度的重疊與混合。情感網絡規模與對社區居民的信任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r=0.06, p<0.01$)，驗證了 Granovetter (1985) 認為強連帶為人們提供信任的基礎之論述。而社區信任與社區意識 ($r=0.75, p<0.01$)、參與程度 ($r=0.40, p<0.01$) 及參與頻率 ($r=0.36, p<0.01$) 也是顯著的正相關。另外，從結果變數的關係，社區意識對參與程度 ($r=0.59, p<0.01$) 及參與頻率 ($r=0.51, p<0.01$) 也是顯著的正向關聯，均顯示社區意識越高，社區參與則越高，反之亦然。而參與程度對參與頻率 ($r=0.70, p<0.01$) 是顯著的正相關。

最後，前述變數間的相關性，顯示居民社區的情感網絡、工具網絡、社區信任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之間環環相扣。但相關係數是未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兩兩變數關聯的結果，因此進一步以階層式迴歸分析檢定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間的關聯性。

(三) 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關聯性之檢定

一、社區意識 (H1)

針對居民社會網絡是否對社區意識有正向顯著預測效果之檢定，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3。在模型二中，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 B 係數為 0.06 ($p<0.01$)、社區工具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 B 係數為 -0.05 ($p<0.05$)，社區信任的未標準化 B 係數則為 0.48 ($p<0.001$)；而相較於僅有控制變數的模型一，整個模型的 Adj R^2 從原本的 0.32 提升到 0.60 ($\Delta R^2=0.27, p<0.001$)，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數與居住狀況的條件下，解釋變數置入模型對依變數的解釋變異量具有明顯的提升效果，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與社區信任，對社區意識的提升會有顯著的預測效果，然而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的提升具有負向的預

表 3 社會網絡（情感網）與社區意識的關聯性（N=642）

變數	社區意識			
	模型一		模型二	
題項	B	VIF	B	VIF
截距	1.64		0.81	
控制變數				
性別	0.03	1.11	-0.00	1.13
年齡	0.00	2.57	-0.00	2.62
婚姻	0.11	1.38	0.11*	1.38
健康情形	0.02	1.05	0.01	1.06
經濟狀況	0.01	1.58	0.00	1.58
社經地位	0.08*	1.71	0.05*	1.71
居住時間	0.00	1.73	0.00**	1.74
居住位置	0.03	1.16	0.01	1.18
熟識程度	0.22***	1.57	0.06**	1.89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0.06**	3.29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0.05*	3.29
社區信任			0.48***	1.47
R ²	0.33		0.61	
Adj R ²	0.32		0.60	
F	31.80***		73.24***	
△R ²	0.33***		0.2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 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 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 表中 B 值為未標準化 B 係數。

測效果。換言之，居民社區情感網絡的規模越大，社區意識越高；而居民的社區信任越高，關係品質越好，社區意識也越高，H1-1、H1-3皆得到了統計上的支持。反之，居民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大，社區意識則越低，H1-2未獲得支持。

二、社區參與（H2 與 H3）

針對居民社會網絡是否對社區參與有正向顯著影響，其分析結果如表4。在以參與程度為依變數的模型二中，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B係數為0.12 ($p < 0.001$)、社區工具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B係數為-0.15 ($p < 0.001$)，社區信任的未標準化B係數則為0.27 ($p < 0.001$)；而整個模型的Adj R²從原本的0.15提升到0.23 ($\Delta R^2 = 0.08$, $p < 0.001$)，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數與社區居住條件下，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社區信任對參與程度的提升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則對參與程度的提升具有負向顯著的預測效果。換句話說，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參與程度的認知越高；社區信任越高，參與程度也越高。H2-1、H2-3皆得到統計上的支持。相反地，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高，參與程度則越低，H2-2未獲得支持。

此外，在以參與頻率為依變數的模型二中，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B係數為0.12 ($p < 0.01$)、社區工具網絡規模的未標準化B係數為-0.11 ($p < 0.05$)，社區信任的未標準化B係數則為0.27 ($p < 0.001$)；而整個模型的Adj R²從原本的模型一的0.15提升到0.20 ($\Delta R^2 = 0.05$, $p < 0.001$)，顯示在控制了個人背景變數與社區居住條件變數之後，社區情感網絡規模、社區信任對參與頻率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則同前模式，與參與頻率有負向關聯性。換言之，居民間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參與頻率也會越高；社區信任越高，參與頻率也越高。H3-1、H3-3在統計上皆得到支持。反之，居

表 4 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的關聯性 ($N=642$)

變數	參與程度				參與頻率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題項	B	VIF	B	VIF	B	VIF	B	VIF
截距	0.94		0.50		0.70		0.20	
控制變數								
性別	0.18*	1.11	0.17*	1.13	0.17	1.11	0.17	1.13
年齡	-0.00	2.57	-0.00	2.62	-0.00	2.57	-0.00	2.62
婚姻	0.09	1.38	0.09	1.38	-0.04	1.38	-0.03	1.38
健康情形	0.07	1.05	0.06	1.06	0.07	1.05	0.06	1.06
經濟狀況	-0.01	1.58	-0.01	1.58	-0.05	1.58	-0.06	1.58
社經地位	0.16***	1.71	0.15***	1.71	0.16**	1.71	0.14**	1.71
居住時間	0.00**	1.73	0.00**	1.74	0.00**	1.73	0.00**	1.74
居住位置	-0.02	1.16	-0.03	1.18	-0.07	1.16	-0.08	1.18
熟識程度	0.16***	1.57	0.07**	1.89	0.20***	1.57	0.11**	1.89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0.12***	3.29			0.12**	3.29
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0.15***	3.29			-0.11*	3.29
社區信任			0.27***	1.47			0.27***	1.47
R ²	0.16		0.25		0.16		0.21	
Adj R ²	0.15		0.23		0.15		0.20	
F	12.78***		16.05***		12.62***		13.14***	
△R ²	0.16***		0.08***		0.16***		0.0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 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 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 表中 B 值為未標準化 B 係數。

民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大，參與頻率反而越低，H3-2 未獲得支持。

三、社區總體營造經驗差異之調節效果 (H4 與 H5)

本研究採用分組法來針對社區營造經驗的差異 (Clogg, Petkova and Haritou 1995; 榮泰生 2006)，是否對居民社會網絡、社區信任與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的關係之間造成調節效果進行比較性的驗證，以有營造經驗的樣本與無營造經驗的樣本進行主要效果的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5 與表 6。

首先，就以社區意識做為依變數的模型來說，控制變數的部分，無論在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與里長的熟識程度越高，對社區意識的預測且皆達到顯著的效果，但若是婚姻、社經地位與居住時間，則只有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對社區意識的預測效果達到顯著。再者，在無營造經驗社區的模型，主要的解釋變數僅有居民社區信任 ($B=0.49, p < 0.001$) 對社區意識的提升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反之，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高 ($B=0.08, p < 0.01$)，對社區意識的提升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高，則社區意識 ($B=-0.09, p < 0.01$) 越低，也達到顯著水準；而社區信任程度越高，社區意識的提升 ($B=0.50, p < 0.001$) 則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

此外，為了增加分析結果強度，本研究也進一步比較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樣本之所有模組係數 (coefficients)，檢驗係數在兩個樣本的模組中是否有顯著性差異，若求出來的 $|z|$ 值大於 1.96，則表示兩個樣本之迴歸係數有顯著差異 (Clogg et al. 1995)，其計算公式如下：

$$Z = \frac{b_1 - b_2}{\sqrt{SEb_1^2 + SEb_2^2}}$$

從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Z=-1.77$) 與工具網絡規模 ($Z=$

表 5 社區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社區意識

變數	社區意識						Z
	無營造經驗			有營造經驗			
	B	S. E.	VIF	B	S. E.	VIF	
截距	0.69	0.26		0.80	0.23		
控制變數							
性別	-0.06	0.06	1.11	0.05	0.05	1.19	-1.33
年齡	0.00	0.00	2.47	-0.00	0.00	2.59	1.10
婚姻	0.03	0.07	1.60	0.16**	0.05	1.25	-1.35
健康情形	0.04	0.03	1.05	-0.00	0.03	1.15	1.13
經濟狀況	-0.01	0.02	1.60	0.02	0.02	1.68	-1.30
社經地位	0.03	0.04	1.61	0.07*	0.03	1.83	-0.12
居住時間	0.00	0.00	1.54	0.00**	0.00	1.66	-1.06
居住位置	0.03	0.03	1.10	-0.00	0.02	1.27	0.91
熟識程度	0.08**	0.03	1.53	0.05*	0.02	1.80	0.63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規模	0.00	0.03	4.53	0.08**	0.02	2.63	-1.77
社區工具網規模	0.00	0.04	4.54	-0.09**	0.02	2.63	1.87
社區信任	0.49***	0.03	1.20	0.50***	0.03	1.65	-0.23
R ²		0.52			0.63		
Adj R ²		0.50			0.61		
F		24.80***			40.26***		
△R ²		0.32***			0.27***		
N		317			32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 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 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 表中 B 值為未標準化 B 係數。

1.87)、社區信任 ($Z=-0.23$) 來說，雖然有無營造社區的情感性關係與工具關係、社區信任之 Z 值並不顯著，但可從兩者還是可以看得出相較於無營造經驗的社區，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其情感性關係的規模與社區信任，皆對社區意識的解釋變異量的變化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而工具性網絡則是負向顯著的效果。雖然從分組法的 Z 值來說，有營造與無營造的迴歸係數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水準， $H4$ 無法獲得支持，但與無營造經驗社區樣本不同的是，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在所有的解釋變數對社區意識提升的預測能力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效果。

繼之，如表 6 所示，以參與程度的認知做為依變數的模型來說，在控制變數的部分，無論在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社經地位、與里長的熟識程度越高，對參與程度的預測且皆達到顯著的效果，但若是性別與居住時間，則只有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才會對參與程度的高低產生預測效果；而年齡、居住位置也只有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的居民產生預測效果，但對參與程度的影響卻是負向。再者，在無營造經驗社區的主要解釋變數中，僅有居民的社區信任 ($B=0.32, p<0.001$) 對參與程度認知變異量的解釋力達正向顯著效果。反之，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 ($B=0.16, p<0.01$)，對參與程度的提高具有預測效果；社區工具網絡規模越大，則參與程度 ($B=-0.20, p<0.001$) 越低；社區信任程度越高，參與程度 ($B=0.28, p<0.001$) 也會越高。

本研究進一步以 Z 值檢定兩社區之迴歸係數，在控制變數中，性別 ($Z=-2.26$) 與居住位置 ($Z=2.74$) 產生顯著差異。在解釋變數中，兩社區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Z=-1.86$) 與社區信任 ($Z=0.41$) Z 值小於 1.96，兩迴歸係數的差異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從迴歸係數的顯著性來說，還是看得出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其社區內情感

表 6 社區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參與程度

變數	參與程度						Z
	無營造經驗			有營造經驗			
	B	S. E.	VIF	B	S. E.	VIF	
截距	0.06	0.32		0.55	0.44		
控制變數							
性別	0.02	0.08	1.11	0.33**	0.11	1.19	-2.26
年齡	0.00	0.00	2.47	-0.00*	0.00	2.59	1.59
婚姻	0.05	0.09	1.60	0.10	0.11	1.25	-0.31
健康情形	0.07	0.04	1.05	0.06	0.06	1.15	0.15
經濟狀況	-0.03	0.03	1.60	-0.02	0.04	1.68	-0.15
社經地位	0.10*	0.04	1.61	0.20**	0.07	1.83	-1.06
居住時間	0.00	0.00	1.54	0.00*	0.00	1.66	-0.47
居住位置	0.07	0.04	1.10	-0.11*	0.05	1.27	2.74
熟識程度	0.07*	0.03	1.53	0.10*	0.05	1.80	-0.44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規模	0.03	0.04	4.53	0.16**	0.05	2.63	-1.86
社區工具網規模	-0.05	0.05	4.54	-0.20***	0.05	2.63	2.00
社區信任	0.32***	0.04	1.20	0.28***	0.06	1.65	0.41
R ²		0.33			0.23		
Adj R ²		0.30			0.20		
F		11.21***			7.31***		
△R ²		0.13***			0.08***		
N		317			32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 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 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 表中 B 值為未標準化 B 係數。

性關係的規模與社區信任，皆對參與程度的提升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另外，以居民的社區工具網絡規模 ($Z=2.00$) 來說，無營造經驗的居民，在工具網絡規模與參與程度的關聯性並不顯著，然有營造經驗的社區更容易因為工具網絡規模越高而導致社區參與程度越低。故社區營造經驗的差異對於控制變數、解釋變數和參與程度間的關係，在性別、居住位置與社區工具網絡規模造成了某種程度的調節效果，特別是有營造經驗讓社區居民的工具網規模對參與程度的負向影響達到顯著，故 H5-1 在本研究的資料上部分得到統計上的驗證。

最後，以參與頻率為依變數的模型來說，控制變數的部分，無論在有無營造經驗的社區，與里長的熟識程度越高，皆對提升參與頻率有正向的預測效果，這很有可能是因為與里長熟識的居民較容易被里長動員。但若是健康情形、社經地位與居住時間，則只有有營造經驗社區的樣本對參與頻率的預測效果達到顯著水準。再者，在無營造經驗的社區，主要的解釋變數中，僅有居民社區信任 ($B=0.33, p<0.001$) 對參與頻率變異量的解釋達正向顯著的效果。反之，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越大 ($B=0.17, p<0.01$)，參與頻率也越高；社區居民工具網絡規模越大，則參與頻率 ($B=-0.19, p<0.01$) 與前述相同，為負向的預測效果；而社區信任程度越高，對居民參與社區事務頻率的提升 ($B=0.24, p<0.01$) 也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此外，本研究進一步以 Z 值檢定兩社區迴歸係數之差異，社區情感網絡規模 ($Z=-1.49$) 與社區信任 ($Z=0.93$) 之 Z 值並未超過 1.96，兩者係數未達顯著差異，然從各自迴歸係數的顯著性，還是可以看出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情感性關係規模與社區信任皆對參與頻率有顯著且正向的預測效果。另外，以兩個居民的工具網絡規模迴歸係數 Z 值 ($Z=2.03$) 來說，兩者差異達顯著水準。換言之，原本無營造經驗的社區

表 7 社區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參與頻率

變數	參與頻率						Z
	無營造經驗			有營造經驗			
	B	S. E.	VIF	B	S. E.	VIF	
截距	0.45	0.39		-0.11	0.59		
控制變數							
性別	0.02	0.09	1.11	0.29	0.14	1.19	-1.52
年齡	-0.00	0.00	2.47	-0.00	0.00	2.59	0.00
婚姻	-0.00	0.11	1.60	-0.02	0.15	1.25	0.13
健康情形	-0.02	0.05	1.05	0.21*	0.08	1.15	-2.33
經濟狀況	-0.02	0.03	1.60	-0.12	0.06	1.68	1.34
社經地位	0.07	0.05	1.61	0.20*	0.09	1.83	-1.15
居住時間	0.00	0.00	1.54	0.01**	0.00	1.66	-1.60
居住位置	-0.02	0.05	1.10	-0.13	0.07	1.27	1.22
熟識程度	0.12**	0.04	1.53	0.10	0.07	1.80	0.30
解釋變數							
社區情感網規模	0.04	0.05	4.53	0.17**	0.06	2.63	-1.49
社區工具網規模	0.00	0.06	4.54	-0.19**	0.07	2.63	2.03
社區信任	0.33***	0.05	1.20	0.24**	0.09	1.65	0.93
R ²		0.22			0.21		
Adj R ²		0.19			0.17		
F		6.62***			6.27***		
△R ²		0.11***			0.04***		
N		317			32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

2. 婚姻：無配偶為 0，有配偶為 1。

3. 社經地位：由高至低，分別為一至五個等級。

4. 表中 B 值為未標準化 B 係數。

居民在社區工具網規模和參與頻率是正向但未達顯著的關係，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居民會因較大的工具網絡規模，對社區參與頻率的提升有負向顯著的預測效果，社區營造經驗的差異對解釋變數和參與頻率間的關係造成了負向且顯著的調節效果，故 H5-2 對正向調節效果的假設並未得到統計上的支持。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社區居民的角度，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了解居民間社會網絡對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影響，繼之驗證社區營造的經驗是否有助於強化居民間的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程度，系統性地檢視社區營造所產生的效果。

在社會網絡與社區意識的關聯性，居民社區情感網絡規模或社區信任，皆能對社區意識的提升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H1-1 與 H1-3 成立）；以及在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的關聯性，居民的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與社區信任也皆能顯著且正向的解釋居民參與程度的認知及參與頻率的變異程度（H2-1、H2-3 與 H3-1、H3-3 成立）。居民間情感網絡是以感情為基礎，並以社區為範圍的社會互動及關係系統，具有強連帶與互動緊密的特質，透過生活中所累積的熟悉感與信任建立社區共識，進而增進社區互動，強化社區認同感，厚植社區的社會資本。社區信任反映出與社區鄰里關係的品質，信任感越高，對於產生更強烈的集體意識及參與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效果，以上也呼應了李俊豪（2010）、林信廷等（2012）、黃源協等（2011）的研究結果。

此外，居民的社區工具網絡規模對社區意識、參與程度認知及參

與頻率的影響雖然顯著，但卻呈現負向關聯性，與本研究的假設相反（H1-2、H2-2 與 H3-2 皆不成立），且調節效果的檢定上，Z 值也達差異顯著的判斷標準。也就是說，當受訪者在工具性的互動上來自社區內鄰里的協助越多，則社區意識強度下降，也會對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的提升產生負向的預測效果，居住在有營造的社區居民更是如此。這很有可能反映都市型的社區人際關係較為疏離，而工具性網絡可視為一種弱連帶的關係，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能動員異質性的資源，其互動不必然很密切，並非是建立在緊密聯繫的基礎之上（Granovetter 1973），關係的成立是一種理性計算的結果。社區營造的效果，雖然增加了居民的工具性互動的規模，僅是讓居民更容易去動員異質性資源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非提高社區意識或參與社區事務。因此，社區內工具性網絡規模較大的居民，雖然較容易找社區鄰里協助，具有動員異質性資源的優勢，但卻未必會與鄰里間形成緊密的關係，工具性網絡規模大的居民不見得會有高的社區集體意識，自然也不見得會對其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意願有正向的預測效果。

若從本研究兩個社區居民的分析結果檢視，社區營造的投入與經驗，應有助於社區居民擴大自身情感網絡與工具網絡規模。但分別從兩種網絡與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關聯性，可以發現情感性網絡的功能，較能正向提高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強化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工具性網絡的功能較為偏向讓居民更容易動員社區內的鄰里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提高自身社區內的社會支持網絡，與社區凝聚力或參與的提升不必然有正向關聯性。

在有無營造經驗調節效果與差異性的檢定上，社區營造經驗對於社區情感網絡規模與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之關係，以及社區信任與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之關係，雖然 Z 值並未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營造經驗的調節效果並未有統計上的支持，但相較於未有營造經驗的社區，仍可看出有營造經驗的社區在自依變數的關係上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對照 T 檢定的結果，也發現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與沒有營造經驗社區的居民，在兩種網絡關係的規模、社區信任的強度、社區意識的高低，社區參與和頻率皆有極其顯著的差異。從過去以社區負責人為調查主體的研究發現，社區營造的經營與成果，可正向影響社區社會資本的累積，使居民更加融入社區生活，建立人際關係互動網絡，強化社區居民的認同感、發揮更大的集體力量，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讓社區營造能永續發展，甚至進一步促使社區達成公共化與民主化的成效，成為草根民主實踐的場域（黃源協、劉素珍 2009；楊桂珍 2009；黃源協等 2010；蕭揚基 2015）。因此，本研究以居民為調查主體所分析的結果，更顯示了社區營造與本研究主要調查變數之間的關聯性，社區營造的經營有利於對居民的社區意識及參與行為產生積極正面的培養效果，也有利於重建社區內的鄰里互動網絡與強化社區信任。

從迴歸模型的分析結果來看，控制變數也呈現了三個重要分析結果：

首先，社經地位在本研究是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的綜合指標，是影響社區參與程度和頻率的重要背景因素，而社經地位越高，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具有負向顯著的預測效果；雖然這個結論與陳茂祥（1985），以及 Chen et al.（2013）的研究看法不同，但卻呼應了 Oh（2003）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的推測是認為都市型社區的居民在社經條件越好的狀況下，可能在工作上或其他事務上投入的時間較多，較沒有多餘的精力去參與社區的事務。

第二，本研究亦發現，在社區居住時間的長短對社區參與程度與

頻率的提升產生正面的預測效果，特別是在有營造經驗的社區裡，居民居住在該社區的時間的長短，更容易對社區活動參與造成正面影響，也更容易對社區產生認同度，並對社區公共事務表達更多的關切，進而擁有較高的參與意願，此一結果與林勝義（1990）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研究鮮少將與里長熟識程度的變數置入研究中探討，而本研究發現熟識程度也能對社區意識、參與程度及參與頻率的提升產生正面的預測效果，亦即居民與里長越熟識，越容易產生較高的社區意識及較強烈的參與意願和行爲，這很有可能是因爲與里長熟識的居民，較容易得知社區事務的訊息，在社區內的參與效能感較強，也容易被動員去參與社區內的公共事務。

最後，本研究採用自我中心網絡並結合提名法來測量居民間情感與工具網絡的規模，在社會網絡分析當中已經是很成熟，應用很廣的操作方法。國內的大型調查，也早在 1997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中，採用過同樣的方法，對社區居民的網絡資料進行蒐集與分析。但若是在社區研究領域內，特別是對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則幾乎都是採用認知量表對關係進行認知性的調查，得知的是居民或社區里長對居民間關係的印象，而非從居民自身出發的實際關係，在關係的測量便呈現出較爲間接的測量效果（黃源協等 2010；黃源協等 2011）。從本研究社區情感網與工具網的規模來看，社區內情感網平均僅有 1.29 人，而工具網僅有 1.19 人，其中情感網與工具網中的對象是親屬關係的平均還是有六成以上，這樣的比例與羅家德（2014）研究中國農村社區關係網親友比例（0.83），以及趙延東（2011）對中國城市居民網絡強連帶比重（0.87）的結果稍低；² 但與熊瑞梅（2001）以 1997 年第三

2 羅家德（2014）與趙延東（2011）的親友比例或強連帶的操作型定義除了親屬外，

次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分析結果相較，熊瑞梅分析的情感網絡親屬比例接近六成，工具網絡比例則超過六成，與本研究結果相似。顯見無論是中國大陸或台灣平日構築的人際網絡，社區鄰里間的互動關係大多還是跨不過親屬，社區營造的投入對建立非親屬人際關係的效果並不顯著，關係建立的同質性高但異質性弱，使得社區內的情感網絡與工具網絡也相對狹窄。

（二）研究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針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提升，以及強化居民間的社會關係網絡，厚植社區社會資本，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從描述統計的結果來看，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程度及頻率的整體得分普遍較低，特別是參與程度認知與頻率都不足中位數，顯見都市型社區居民對社區集體事務參與的冷漠，更遑論能透過社區參與來達成基層民主，厚植公民社會潛能的目的。其原因是可能是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區人們的工作較為忙碌，每天回到家就是睡覺，也與鄰里間缺乏互動，以致於難以對一個居住的區域形成集體意識，也缺乏對社區事務的投入，此現象是社區政策規劃者與社區營造的實踐者所不容忽視的，亦是社區工作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從社區營造的目的來說，社區意識的凝聚需要增加居民對所處社區情感的積累，提升對社區的依附感，進而達到水平交流，並從中培養出關懷社區公共事務的精神與參與感，促進社區生活改善的實現。而為達到讓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除了透過營造活動培養居民間互動網絡，增強鄰里互信之外，首要之務也要強化社區做為一個公共化與民主化的參與空間，

還包含密友與好友，故比例可能因此比本研究與熊瑞梅（2001）的分析結果稍高。

提升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效能感，而非讓參與或社區意識僅限於與里長交好之人。比如說：現今推動社區審議式公民參與模式，透過鼓勵民眾直接參與政策精神的實踐，增強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能量，提升社區意識，讓公民社會更加完善（Rifkin 2014）。透過居民、政策規劃者與社區幹部共同參與社區事務與協商，使居民不僅有機會表達自己意見和增加被聆聽的機會，更要學習尊重他人的觀點和態度，以期提升民主質量（林子倫 2008）。

第二，拓展社區居民情感性網絡的建立。依據分析結果所述，情感性網絡無論對社區意識或社區參與，均達到正向顯著的效果。雖然情感性網絡的特質是爲了滿足個人在關愛、溫情、安全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法則，獲得社會支持，大多建立在與家人的互動關係上，因此具有強連帶的特質，互動密度高。然社區居民的情感網絡若僅侷限自己的親屬，並沒有拓展到一般的鄰里，便很難把信任關係從家人推展到鄰里，相對來說便難以營造社區的意識，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也可能僅侷限於與里長熟識的社區居民，更不可能促成廣泛的社區參與。據此，社區營造的投入與經營，對拓展居民間情感性網絡便顯得相當重要，特別是對非親屬情感性網絡的拓展。建議以社區發展協會或村里辦公處爲主軸，多舉辦社區性的聯誼活動，讓社區居民能多到社區公共的場所交流互動，促進彼此的認識，拓展社區居民間除了家人以外的情感性關係網絡，讓居民與社區鄰里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累積社區參與的能量，以利社區意識的培養並促進社區發展。

第三，社區信任的測量反映了社區內居民關係的品質。在本研究中，無論在有營造或無營造的社區當中，社區信任對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程度及頻率皆造成正向且顯著的影響，鄰里間的信任感對於社群認同與參與的促進效果，比情感性網絡的滲透力更強。居民間情感性

網絡需要社區營造的激發，才能對社區意識及參與產生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但對鄰里的信任關係不論在哪種社區，均能轉化為促進網絡互動的驅力，進一步帶動社區社會資本的良性循環，厚植社區意識與公共參與能量。換言之，信任更是社群認同與集體行動的基礎。基此，鄰里間信任的提升有必要列為促進居民間人際互動與資訊流通的重要社區工作之一。從 Granovetter (1985) 的觀點來說，其認為強連帶為人們提供信任的基礎，而鄰里信任又可以強化居民的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因此鄰里間情感性關係的提升可視為促成社區信任的重要策略之一。具體策略上，可藉由居民共同關心的議題，凝聚社區的意識與認同感，將意識層次的力量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引發社區更廣泛的參與，並回饋到居民間關係網絡與鄰里信任的提升（林信廷等 2012）。

最後，本研究的結果驗證了社區營造的經驗對居民網絡、社區信任、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正向效果，社區營造政策的持續推動，有利於台灣營造一個具有豐富社會資本與參與熱情的社會。從研究結果顯示，落實社區營造政策能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然而目前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的社區當中，真正進行社區營造的社區僅不到四分之一，也反映了台灣社區營造的工作尚有努力的空間。

社區總體營造是草根性的社會運動，需要居民理念上的認同，更需要動員參與，才能讓社區營造的政策目標開花結果。社區民主的理念若要進一步發展，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推手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由於與里長熟識會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有正向的關聯性，此也代表了里長應該要勤走動，多與鄰里鄉親接觸，而非把互動集中在社區內少數人身上，並透過展開一連串積極的社區建設，推廣鄉土關懷的社區營造運動，從意識形態上塑造涵蓋全體成員共同體的和諧關係，營造良好生活環境，讓社區居民願意持續住在社區中，降低流

動性，才能有效累積社區意識。此外，社區政策若要在民眾生活的社區扎根與實現，就必須透過全民直接且自主的參與，擴大集體民主的內涵，才能對公共事務決策問題產生因應及解決的辦法。同時藉由「社區培力」以協助社區民眾具備參與各項社區事務之意識、知識認知與操作能力，進而培養凝聚社區意識、健全社區組織的運作。

此外，除了上述政策建議，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上，本研究針對操作方法與研究議題提出以下三點未來研究上的建言：

首先，本研究以台南市中西區銀同里與五妃里為調查對象，因此研究結果的推論，僅限於該地區社區居民，不宜作過度的推論。雖然台南市中西區在都市化程度分類指標中是屬於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區域（劉介宇等 2006），但畢竟僅是台南市裡的兩個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社區，一方面沒辦法代表全台南的情況，更遑論代表全台灣都市型社區的情形。況且本研究對研究對象的挑選雖已盡可能尋找除營造經驗外同質性高的社區，但也無法保證兩個社區樣本特質完全不具差異。建議若是有更多的研究資源與經費，應該要更普及性的針對不同社區進行調查，特別是鄉（農）村型及山地型有營造與沒有營造的社區，比對都市型與其他不同類型社區的差異。倘若社區的樣本數規模夠大，同時也包含社區內居民的調查資料，或許也可更進一步考慮跨階層分析的研究設計，更精緻地了解社區與個人因素對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的影響。

再者，本研究在情感網絡規模與工具網絡規模兩者間的相關係數偏高，可能會對模型的解釋力產生威脅，造成變數的壓抑效果。但若從比較寬鬆的統計標準來說，Dillon and Goldstein（1984）認為自變數間的相關係數達 0.85 以上需擔心有明顯的共線性威脅，本研究尚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內；且本研究的 VIF（設定為 10，嚴格一點設定為 5）

與 CI (超過 30) 都沒有超過 Cohen et al. (2003)、邱皓政 (2015, 2017) 及 Lattin et al. (2003) 所設定的標準，共線性也應該較為緩和。且從理論的意義來說，情感網絡與工具網絡的概念應該是有明顯區隔性，一般進行社會網絡的調查也多用情感網與工具網分別進行調查與分析，情感網與工具網同時存在與作用也比較符合實際情境。雖然在測量規模的相關統計量上呈現高度相關的情形，但本研究測量的情感與工具網指涉的是規模（人數），而非關係的內容（對象與互動關係的內涵），因此相關性高的結果，反映的是兩者關係數量有正向的關聯，而非兩者的關係對象與內涵有高度重疊。單純從相關係數的統計量來看，華人社會中情感性與工具性關係似乎有某種程度的重疊與混合，可能會影響提名法在華人社會中測量情感網與工具網的區辨效度，是一個值得被關注的方法議題，也期待後續的研究在測量工具的信效度上能有更具突破性的進展。

最後，本研究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中的自我中心網的研究設計，並輔以提名法來測量居民情感與工具的網絡規模，雖然在社會網絡分析中並非屬於新穎的方法，但社區研究的學者卻甚少有人使用。本文資料蒐集與分析的結果，也證明除了認知量表之外，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來測量社區居民關係網絡的規模與品質。然本文在居民間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中，僅是應用了比較粗淺的網絡指標來進行討論，還有其他不同的網絡分析指標可供應用與探索。因此本文社區居民網絡關係測量指標的應用上僅能算是初階與初探性質的使用，對關係網絡與社區意識和參與提升的關聯性的解釋也需要較為保守，建議後續研究能持續的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並在社區研究中結合網絡理論使用更複雜且精確的網絡指標與工具，以累積社會網絡分析法在社區研究的適用性。

附錄 1 樣本特徵描述

銀同里樣本特徵描述 (N=325)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社經地位		
女	197	60.60	第一等	5	1.50
男	128	39.40	第二等	11	3.40
年齡			第三等	61	18.80
19 歲以下	7	2.20	第四等	117	36.00
20-29 歲	51	15.70	第五等	124	38.20
30-39 歲	45	13.80	漏答	7	2.20
40-49 歲	48	14.80	居住時間		
50-59 歲	60	18.50	從小就住在這裡	162	49.80
60 歲以上	114	35.10	從其他地方遷入	163	50.20
婚姻			居住位置		
無配偶	131	40.30	非常遠	6	1.80
有配偶	194	59.70	有點遠	27	8.30
健康情形			有點遠	92	28.30
非常差	3	0.90	還算近	95	29.20
有點差	45	13.80	非常近	105	32.30
普通	137	42.20	與里長熟識程度		
還好	116	35.70	完全不認識	24	7.40
非常好	24	7.40	不太認識	41	12.60
經濟狀況			普通	85	26.20
無固定收入	128	39.40	還算熟識	65	20.00
2 萬以下	28	8.60	非常熟識	110	33.80
2-3.9 萬	111	34.20			
4-5.9 萬	40	12.30			
6-7.9 萬	7	2.20			
8-9.9 萬	6	1.80			
10 萬 (含) 以上	5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妃里樣本特徵描述 (N=317)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社經地位		
女	196	61.80	第一等	10	3.20
男	121	38.20	第二等	14	4.40
年齡			第三等	80	25.20
19歲以下	16	5.00	第四等	128	40.40
20-29歲	99	31.20	第五等	72	22.70
30-39歲	49	15.50	漏答	13	4.10
40-49歲	47	14.80	居住時間		
50-59歲	60	18.90	從小就住在這裡	110	34.70
60歲以上	46	14.50	從其他地方遷入	207	65.30
婚姻			居住位置		
無配偶	165	52.10	非常遠	6	1.90
有配偶	152	47.90	有點遠	29	9.10
健康情形			有點遠	128	40.40
非常差	7	2.20	還算近	95	30.00
有點差	18	5.70	非常近	59	18.60
普通	144	45.40	與里長熟識程度		
還好	125	39.40	完全不認識	104	32.80
非常好	23	7.30	不太認識	82	25.90
經濟狀況			普通	69	21.80
無固定收入	103	32.50	還算熟識	40	12.60
2萬以下	35	11.00	非常熟識	22	6.90
2-3.9萬	104	32.80			
4-5.9萬	38	12.00			
6-7.9萬	23	7.30			
8-9.9萬	3	0.90			
10萬(含)以上	11	3.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錄 2 問卷題項

一、社會網絡

請問最近一年來，當您與人談起個人的私密事情、煩惱（比如有隱疾或疾病治療等問題）或遇到重大難以抉擇的事情時，經常會找的人大概有多少？其中幾人是居住在本社區的？前述同社區的人中有哪此具有親屬關係？

請問最近一年來，當您個人在生活碰到一些困難時，例如：工作上、錢財上、家庭上、法律上、生病時，您會尋求幫助的人大概有多少？其中幾人是居住在本社區的？前述同社區的人中有哪些具有親屬關係？

二、社區意識（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點）

我很在意社區居民對我的看法

我覺得我所居住的社區是個令人稱羨的地方

我對於社區內組織或社團的活動很清楚

我認為社區的事就是我的事

當與他人談及社區問題時，我會主動介紹我的社區

我 意經常邀請社區外朋友來參觀我的社區

我搬進社區後，就沒有過想搬出去的念頭

我認為自己該不求回報地為自己的社區做一些事

我可以認得社區中大部分的居民

我會主動與社區居民討論有關社區的事情

我認為瞭解自己所居住的社區是重要的

我可以很容易找到社區中每一家戶的正確位置

三、社區信任（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點）

我信任社區內大多數的街坊鄰居

我信任社區的（村）里長

我信任社區裡的志工及服務幹部

我信任社區裡的服務團體或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宗教團體）

四、社區參與程度認知（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點）

我能夠實際得知社區何時將舉行社區會議

我能夠實際得知（如：從布告欄、鄰居間的告知）社區即將舉辦的相關活動

我能夠獲邀加入社區的團體或組織（如：媽媽教室、巡守隊、環保義工隊等）

我有實際出席社區舉辦的相關活動

我有實際出席社區所舉辦的會議

我有實際參與社區的組織或團體（如：媽媽教室、巡守隊、環保義工隊等）

我能夠在社區中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想法

我能夠實際參與社區相關議題的討論

我能夠實際參與社區相關議題的決策

我能夠提供與社區發展有關的意見或想法供社區參考

五、社區參與頻率（從不參加到總是參加，5 點）

使用社區活動場所或到人潮聚集地點

參加社區舉辦的各類活動

出席里民大會

加入社區組織或團體

出席社區組織或團體的會議

積極參與會議與討論

擔任社區組織或團體的幹部、志工

積極協助組織或團體的服務工作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2005，《社造番仔火》。台北：唐山。
- 王光旭，2015，〈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4: 67-134。
- ，2016，《制度化福利混合經濟下的公私合夥、服務輸送與績效評估：台南與台中都會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運作與成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NSC 101-2628-H-024-001-MY3）。
- 丘昌泰、洪鴻智、陳金貴，2002，〈建立市民導向的社區參與制度：北市經驗之評析〉。《行政暨政策學報》35: 1-44。
- 江大樹、張力亞，2016，《地方治理：變革、創新與實踐》。台北：元照。
- 呂寶靜，2012a，《高齡社會的來臨：為 2025 年臺灣社會規劃之整合研究——臺灣老人社會整合之研究：以社區生活參與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NSC 97-2420-H-004-159-KF3）。
- ，2012b，《臺灣老人社會整合之研究：以社區生活參與為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2): 90-96。
- 李俊豪，2008，〈鄰里凝聚量表在臺灣鄉村研究之適用性〉。《公共事務評論》9(2): 55-86。
- ，2010，〈臺灣居民之社區意識——系統模式之分析〉。《都市與計劃》37(2): 209-231。
- 李維貞，2013，《社會網絡、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觀光發展之研究——以大甲溪流域社區為例》。臺中：逢甲大學土木及水利工程博士學位學程博士論文。
- 林子倫，2008，〈審議民主在社區：臺灣地區的經驗〉。論文發表於「海峽兩岸參與式

- 地方治理研討會」，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8年9月22-23日。
- 林生傳，2005，《教育社會學》。臺北：巨流。
- 林信廷、莊俐昕、劉素珍、黃源協，2012，〈Making Community Work：社會資本與社區參與關聯性之研究〉。《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0(2): 161-210。
- 林勝義，1990，《老人參與社區發展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 林雅真，2008，《民眾參與與社會資本之研究——以彰化縣伸港鄉泉厝社區營造口袋公園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瑞欽，1994，〈社區意識的概念、測量與提振策略〉。《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 1-21。
- ，1995，〈「社區意識」凝聚之道〉。《社會福利》118: 8-17。
- 邱皓政，2015，《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SPSS（PASW）資料分析範例》。台北：五南。
- ，2017，〈多元迴歸的自變數比較與多元共線性之影響：效果量、優勢性與相對權數指標的估計與應用〉。《臺大管理論叢》27(3): 1-44。
- 施教裕，1997，〈社區參與的理論與實務〉。《社會福利》129: 2-8。
- ，1999，〈埔里福利社區化的工作和檢討〉。《社區發展季刊》87: 72-109。
- 洪永泰，1996，《戶中選樣之研究》。台北：時英。
- 紀貝臻，2011，《領導風格與社區參與之關聯性研究：以社會資本觀點探討》。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紀孟君、鄭夙芬、鄭期緯，2011，〈當我們「同在一起」：旗艦競爭型計畫之社區組織結盟歷程探討〉。《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1): 127-168。
- 夏鑄九，1999，〈市民參與和地方自主性：臺灣的社區營造〉。《城市與設計學報》9-10: 175-185。
- 徐仁輝，2014，〈參與式預算制度的理論與實踐〉。《財稅研究》43(2): 1-11。
- 徐震，1995，〈論社區意識與社區發展〉。《社會建設期刊》90: 4-12。
- 張德永、陳柏霖、劉以慧，2012，〈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社區社會資本、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之關係〉。《高雄師大學報》32: 25-46。
- 郭瑞坤、王春勝，2004，〈地區發展相關因素整合居民結構區隔研究〉。《戶外遊憩研究》17(1): 23-49。
- 郭瑞坤、王春勝、陳香利，2007，〈居民社區培力與社會資本、社區意識關聯性之研究——以高雄市港口社區為例〉。《公共事務評論》8(2): 97-129。
- 郭瑞坤、徐依鈴、張秦瑞、沈逸晴，2013，〈社區議題與社區自主性關聯之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7(11): 1-39。
- 郭彰仁、郭瑞坤、侯錦雄、林建堯，2010，〈都市與非都市計畫區社區居民參與環境改造行為模式之比較研究——以台灣南部為例〉。《都市與計劃》37(4): 393-431。
-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陳美惠、李來錫、王相華、蘇倍以，2008，〈以社會網絡分析法進行社區生態旅遊發展

- 之研究——以社頂部落的共識凝聚為例》。《中華林學季刊》41(2): 221-236。
- 陳茂祥, 1985, 〈淺談一般社區理論〉。《社區發展季刊》32: 32-41。
- 陳香妃、張金鶚、葉毅明, 2007, 〈從集體行動看社區意識與管理制度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之影響——管理維護客觀績效與社區主委主觀滿意度分析〉。《都市與計劃》34(2): 139-163。
- 陳錦煌, 1999, 《21世紀社區總體營造之展望——邁向永續發展的社區生活共同體》, 未出版。
- 曾旭正, 2007, 《台灣的社區營造》。台北: 遠足文化。
- 黃光國, 1988,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 , 2001, 〈儒家關係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方法論基礎〉。《教育與社會研究》2: 1-33。
- 黃富順, 1994, 〈加強社區意識, 建立祥和社會的途徑——社區成人教育〉。《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 23-33。
- 黃源協、莊俐昕、劉素珍, 2011, 〈社區社會資本的促成、阻礙因素及其發展策略: 社區領導者觀點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52: 87-130。
- 黃源協、劉素珍, 2009, 〈社會資本對臺灣社區發展之政策意涵〉。《行政暨政策學報》48: 155-191。
- 黃源協、劉素珍、莊俐昕、林信廷, 2010, 〈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發展關聯性之研究〉。《公共行政學報》34: 29-75。
- 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 2007, 〈社區意識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索性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2): 1-33。
- 楊桂珍, 2009, 《社會資本與社區營造: 以湖口鄉信勢社區為個案研究》。新竹: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溫忠麟、侯杰泰、張雷, 2005, 〈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心理學報》2(37): 268-274。
- 廖俊松, 2004, 〈社區營造與社區參與: 金鈴園與邵社的觀察與學習〉。《社區發展季刊》107: 133-145。
- 廖培珊, 2016, 〈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 兩個鄉村社區之初探〉, 《台灣鄉村研究》, 12: 1-39。
- 榮泰生, 2006, 《SPSS 與研究方法》。台北: 五南。
- 熊瑞梅, 2001, 〈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頁 179-216, 收錄於邊燕杰等編, 《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 方法與發現》。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趙延東, 2011, 〈社會網絡與城鄉居民的身心健康〉。頁 186-204, 收錄於邊燕杰編, 《關係社會學: 理論與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劉介宇、洪永泰、莊義利、陳怡如、翁文舜、劉季鑫、梁賡義, 2006, 〈臺灣地區鄉鎮

- 市區發展類型應用於大型健康調查抽樣設計之研究》。《健康管理學刊》4(1): 1-22。
- 劉麗雯、林雅俐, 2015, 〈社區防救災社會資本指標之建構〉。《公共行政學報》48: 73-108。
- 蔡宏進, 1985, 《社區原理》。台北: 三民。
- 蕭揚基, 2015, 〈社區營造中社會資本對公民治理的影響〉。《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5(2): 137-176。
- 瞿海源, 1999,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997 第三期第三次: 社會網路與社區組 (C00009_2) 【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C00009_2-1。
- 羅家德, 2014, 〈序二: 社區營造與社會建設〉。頁 3-5, 收錄於羅家德、帥滿、方震平、劉濟帆著, 《災後重建紀事: 社群社會資本對重建效果的分析》。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Abbott, J., 1995,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30(2): 158-168.
- Ahlbrandt, R. S., 1984, *Neighborhoods, People and Communit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Andrew, S. A., and R. C. Feiock, 2008, "Methods of Network Analysis." Pp.765-786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ited by K. Yang and G. J. Miller. New York: CRC Press.
- Arnstein, S. R.,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35(4): 216-224.
- Bagnall, R. G., 1989, "Researching Particip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A Case of Quantified Distor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8(3): 251-260.
- Bauman, Z., 2001,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Oxford: Blackwell.
- Bhattacharyya, J., 2004, "Theoriz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34(2): 5-34.
- Borgatti, S. P., 1998, "A SOcNET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1(2): 37-46.
- Buckner, J. C.,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Neighborhood Cohe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6(6): 771-791.
- Bullen, P., and J. Onyx, 2005 [1998],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 A Practitioner's Guide." <http://www.mapl.com.au/pdf/SocialCapitalPracGuideBullen&Onyx.pdf>. (Date visited: Aug. 1 2018).
- Burns, D., and M. Taylor, 2000, *Audi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 Assessment Handbook*. Bristol: Policy Press &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7, “A Note on 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 Content.” *Social Networks* 19(4): 355-373.
- Butler, B., L. Sproull, S. Kiesler, and R. Kraut, 2002, “Community Effort in Online Groups: Who Does the Work and Why.” Pp.171-194 in *Leadership at a Distance: Research in Technologically Supported Work*, edited by Suzanne P. Weisband.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Castells, M., 2010, *The Power of Identit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Chaskin, R. J., 1999, *Defin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rom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 Chicago: Chapin Hall Center for Childr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havis, D. M., and A. Wandersman, 1990,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 Catalyst for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8(1): 55-81.
- Chen, H., T. Zhu, M. Krott, and D. Maddox, 2013, “Community Forestry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Project Desig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3(1): 67-75.
- Clogg, C. C., E. Petkova, and A. Haritou, 1995,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5): 1261-1293.
- Cohen, J., P. Cohen, S. G. West, and L. S. Aiken, 200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ural Science (3rd e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illman, D. A., 2000, *Mail and Internet Surveys: The Tailored Design Method*. New York: Wiley.
- Dillon, W. R., and M. Goldstein, 1984, *Multivariate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Wiley.
- Farrell, S. J., T. Aubry, and D. Coulombe, 2004, “Neighborhoods and Neighbors: Do They Contribute to Personal Well-be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2(1): 9-25.
- Gilchrist, A., 2004, *The Well-connected Community: A Networking Approac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Bristol: Policy Press.
- Glynn, T., 1981,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Human Relations* 34(9): 789-818.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Hahm, J. J., D. Breiter, K. Severt, Y. Wang, and J. Fjelstul,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atisfaction on Future Intentions to Attend an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 *Tourism Management* 52: 151-160.
- Halpern, 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pham, T., E. Grant, and E. Thomas, 2002,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within Health Surveys: Key Issues."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7(1): 106-111.
- Hollingshead, A. B., 1957, *Two 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y, A., 2006,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41(2): 160-173.
- Kim, J., 2007, "Perceiving and Valuing Sense of Community in a New Urbanist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Kentlands."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12(2): 203-230.
- Knoke, D., and S. Yang, 2008,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2nd ed.)*. Los Angeles: SAGE.
- Lattin, J. M., J. Douglas Carroll, and P. E. Green, 2003. *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 Pacific Grove, CA: Thomson Brooks/CoLe.
- Lewicka, M., 2010, "What Makes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Home and City? Effects of Place Scale on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1): 35-51.
- Li, Z., Y. Chen, and L. Suo, 2015, "Impacts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Follow-up Survey of Data Gathered after Ya'an Earthquake." *Iran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4(1): 68-78.
- Lin, N., 1999,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467-487.
- ,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 A. Y. H., and C. Y. Jim, 2010, "Differential Community Effects on Perception and Use of Urban Greenspaces." *Cities* 27(6): 430-442.
- Mattessich, P. W., and B. Monsey, 1997, *Community Building: What Makes It Work-A Review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ccessful Community Building*. St. Paul, MN: Amherst H. Wilder Foundation.
- McMillan, D. W., 1996,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4 (4): 315-325.

- Mitchell, J. C., 1969,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Nahapiet, J., and S. Ghoshal, 1998,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2): 242-266.
- Narayan, D., 1999, *Bonds and Bridges: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Nasar, J. L., and D. A. Julian, 1995,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Neighborho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12): 178-185.
- Nurullah, A. S. MA., 2012, "Received and provided social support: A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Studies* 27(3): 173-188.
- Obst, P. L., and K. M. White, 2007, "Choosing to belong: The influence of choice on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5(1): 77-90.
- OEC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Paris: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ECD.
- Oh, J. H., 2003, "Assessing the Social Bonds of Elderly Neighbors: The Roles of Length of Residence, Crime Victimization, and Perceived Disorder." *Sociological Inquiry* 73(4): 490-510.
- Ohmer, M., and E. Beck, 2006,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in Poor Commun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Neighborhood and Organizational Collective Efficacy."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33(1): 179-202.
- Oorschot, W. V., W. Arts, and J. Gelissen, 2006, "Social Capital in Europe: Measurement and Social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 *Acta Sociologica* 49(2): 149-167.
- Perkins, D. D., and D. A. Long, 2002, "Neighborhood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A Multi-level Analysis." Pp. 291-318 in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Research,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edited by A.T. Fisher, C.C. Sonn and B. J. Bishop. New York: Plenum Publishers.
- Plummer, J., and J. G. Taylor, 2004,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ssues and Processes for Capacity Building*. London: Earthscan.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rezza, M.P., M. Amici, T. Roberti, and G. Tedeschi, 2001, "Sense of Community Referred to the Whole Town: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Loneliness, Life Satisfaction and Area

- of Residen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1): 29–52.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fkin, S. B., 2014, “Examining the Links betwe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9(suppl 2): ii98–ii106.
- Ruiz-Ballesteros, E., and R. Cáceres-Feria, 2016, “Community-building and Amenity Migration in Community-based Tourism Development: An Approach from Southwest Spain.” *Tourism Management* 54: 513–523.
- Sarason, S.B., 1974,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rospects for a Community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auer, W. J., and R. T. Coward, 1985,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 Simplician, S.C., G. Leader, J. Kosciulek, and M. Leahy, 2015, “Defining Social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n Ecological Model of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8: 18–29.
- Skjæveland, O., T. Gärling, and J. G. Mæland, 1996,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Neighboring.”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4(3): 413–435.
- Smith, K. M.,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Sense of Community,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ense of Place in a Western Australian Urban Planned Commun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Edith Cowan University, Perth, WA.
- Sun, C. G., and Z. Q. Zhang, 2015, “Analysis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On the Basis of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Urbanology* 6(1): 29–62.
- Sundar, V., D. L. Brucker, M. A. Pollack, and H. Chang, 2016, “Commun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adults with mobility impairments: A mixed methods study.” *Disability and Health Journal* 9(4): 682–691.
- Tsai, W., and S. Ghoshal,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4): 464–476.
- UNCHS, 1983,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Low-income Housing Projects*. Nairobi: United Nation Center for Human Settlement.
- Unger, D. G., and A. Wandersman, 1983, “Neighboring and Its Role in Block Organizations: An Exploratory Re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1(3): 291–300.

- Vaske, J. J., and K. C. Kobrin, 2001,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2(4): 16-21.
- Wallace, C., K. Vincent, C. Luguzan, L. Townsend, and D. Beel, 201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hesion: A Tale of Two Villag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54: 426-434.
- Wasserman, S., and K.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 L., L. D. Frank, and B. Giles-Corti, 2010, "Sense of Commun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alking and Neighborhood Desig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9): 1381-1390.
- Xu, Q., D. D. Perkins, and J. C. Chow 2010, "Sense of Community, Neighboring, and Social Capital as Predictors of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5(3-4): 259-271.
- Zhao, L., Y. Lu, B. Wang, P. Y. K. Chau, and L. Zhang, 2012,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Motivating User Participation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2(6): 574-588.

